



## 前 言

陳方正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自1968年創刊，至今已整整二十年了。這二十年間，《學報》所刊登的論文、評論總共已不下二、三百篇，它們上起新、舊石器時代，下迄晚清、民國，就題材來說，經典、歷史、文學、哲學、佛道、小學、音韻、考古、藝術、音樂、儀禮、曆法、人物傳記等等無不網羅包容，就所用方法來說，除了傳統的考釋以及陳寅恪先生所謂「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事，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以外，更包括了由考古學、語言學、社會學、經濟學、演繹學等種種現代學問所開闢出來的門徑，從整體看，謂為洋洋大觀，有近於整個傳統中國在現代學者眼中的縮影，也許亦不為過。

《學報》這種兼收並蓄，自由發展，不為定規所拘限的風格，其實亦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研究所自1967年創辦以來的一個特色。在創辦之初，所內同事以周法高、嚴耕望、全漢昇等幾位前輩教授為主，研究工作側重於他們所專擅的聲韻學、古代史、中外交通史等幾個方面；其後，到了七十年代，基於多方面的因緣、動力，並且由於屈志仁、宋淇、高克毅、鄭德坤、劉殿爵等幾位學者、教授輩路藍縷之功，文物館、翻譯與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即今日翻譯研究中心的前身）、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和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等四個單位相繼成立，所的工作乃又逐步向美術史、文學、翻譯、考古、藝術、古代語文以及中文應用這幾個方向擴展。因此，本所今日的規模，可以說是因時制宜，通過自然因應的過程，點點滴滴，日積月累地生長出來的，而並不是依照一個預定的構想，按步就班地去建造出來的。

倘若和現代學術分工日趨精細，方法與架構日益繁密的發展趨勢比照，《學報》的特殊風格和本所的成長方式無疑顯得有點散漫：它們似乎太隨機、太缺乏完整計劃和明確目標了。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風格和成長方式也許並不是壞事——它們甚至可能是自然的，難以避免的。因為中國文化本身，恰恰正就是一個極其龐大複雜，沒有預定構想、規律的體系，是無數人在遼闊的土地上，經過漫長的歲月，因應實際環境和需要，點點滴滴地累積生長出來的。強要通過預定的觀念、方向、理論架構，或者依照一定的組織方式去研究它、了解它，恐難免產生種種偏蔽歪曲，令人過份強調一枝一葉，失去樹林而不自覺。科恩教授（Paul A. Cohen）在他的近著《發現中國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中，就近三、四十年美

國學者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作了全面和深刻的反省，認為其最主要的缺陷乃在於這些學者所應用的研究典範 (paradigm) 都帶有「高度西方中心」(high degree of Western-centeredness) 色彩，所以往往忽視中國的實在歷史進程，因此他提出要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學」，也就是注重中國人的觀點，和能夠辨析中國原有的地區、階層差異的史學。他這個反省也許亦能夠為上述的說法提供一個佐證吧？畢竟，傳統文化和自然現象或者根據一定基本原則而建構的現代社會是不同的，所以要真正了解它，所需的方式和策略，也可能與其他現代學術研究所需的不盡相同。從這個角度看，《學報》的內容並不拘囿於若干專門科目，研究所不預先規定長遠發展路向，也許並非不合時宜，也許還是有其可取的一面的。

誠然，中國文化的研究和經濟學、社會學、醫學、化學、物理學等等的研究不但所需的策略有所不同，它們彼此之間在本質上似乎也有很深的區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探究的，是未知的新現象和新規律，由之而得的成果可以預期對社會的建構和進步產生直接和巨大影響：牛頓、達爾文、亞當斯密、馬克斯不僅是學者，更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巨人，那是沒有疑問的。至於文化的研究，借用朗克(Ranke)的著名說法，也許可以看作是使過去如實地在今日重現，或者一個文化中的事物，在另一文化、另一套觀點、語言之中重現。這「重現」我們今日大體承認，並不是絕對客觀的，而是透過另一種風尚、見識、眼光所得的影象，亦即是說，是今人對過去，或中、西文化彼此之間的觀察和反思。所謂每一個時代都需要把歷史重寫，從廣義而言，恐怕正也就是這個意思。這種觀察和反思，從表面上看，只不過加強了人類今日與過去，或者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連續性，是文化向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所作的投射 (projection)，而並不是創新的工作，所以，對許多人來說，它的至終意義恐怕是不能和自然科學或者社會科學相比擬的。這一關乎學術研究方向的大問題，今日我們自然不能在這裏去詳為辨析。但我想面對這個問題的學者，心目中大概都會立刻浮現出印度佛教東來與中國文化相激盪，因而生出新的禪宗思想，以及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從古典的研究引發出人文主義與科學精神這兩個例子，從而肯定文化研究對樹立學術研究的新典範，開創文化的新風氣的積極和根本意義吧？

香港中文大學自成立以來，一直以發揚中國文化和促進中西文化的融會為其使命，對這使命，中國文化研究所無疑又負有特殊的責任。然而在這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社會瞬息萬變的現代世界之中，傳統文化究竟應該循甚麼途徑發揚，應該在怎樣的基礎之上與西方或現代文化融會，那實在是不易究言，更難以有確定答案的大問題。現在欣逢中大創校二十五週年，中國文化研究所創辦二十一週年和《學報》創刊二十週年這幾個有特殊意義的日子，因此將個人在這大問題上所想到的一些零碎意見寫出來，以就正於本所的同事和友人。

1988年12月2日